

神学：教会在思考

Theology: The Church Thinking

Aiming Wang

王艾明 著

宗教文化出版社

神学：教会在思考

Theology: The Church Thinking

Aiming Wang

王艾明 著

 宗教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学:教会在思考 / 王艾明著 . -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8

ISBN 978 - 7 - 80254 - 294 - 5

I. ①神… II. ①王… III. ①教会 - 中国 - 文集 ②神学 - 文集 IV. ①B978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64848 号

神学:教会在思考

——神学思想建设与中国教会

出版发行：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64095215(发行部) 64095201(编辑部)

责任编辑：张秀秀

版式设计：高秋兰

印 刷：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13.625 印张 350 千字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80254 - 294 - 5

定 价：38.00 元



序

序

再论神学是教会在思考：中国教会
神学建设的任务

陈泽民

我很高兴能够在其付梓出版之前，有机会先拜读金陵协和神学院副院长王艾明博士的《神学：教会在思考》一书，书中收集了王博士过去十年来发表过的论文共 32 篇，这是王博士在过去研究与教学的历程中的部分成果。

我认识王艾明博士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当时我在神学院工作，兼任南京市圣保罗堂的主任牧师。艾明常常到圣保罗堂来参加聚会，后来他在圣保罗堂接受洗礼。那时他已完成了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本科的学习，此后又在南京大学获得了文学硕士学位，他对西方哲学、基督教研究已经很有兴趣，早在 1990 年他便翻译法国天主教神学家德日进的名著《人的现象》和德国著名神学家孔汉思的名著《上帝存在吗？》。



1992 年，他放弃当时在南京师范大学的教席，前往瑞士法语区纽沙泰尔大学 (Université de Neuchatel) 学习神学。经过长达 7 年的学习，于 1999 年获得神学硕士学位，并于当年春天应丁光训主教的邀请，前来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任教。王艾明自从加入金陵协和神学院的 10 年来，无论在教学、研究等各样的事务上都是兢兢业业，尤其是在神学研究上很快便获得学术界的好评与关注。从 1999 年开始，他先后担任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副教务长、研究生部主任、研究部主任；自 2002 年开始至今担任金陵协和神学院副院长、教务长、《金陵神学志》主编、江苏省基督教协会副会长、中国基督教神学教育委员会副主任等重要领导职位。在此期间，王艾明于 2003 年还赴瑞士德语区巴塞尔大学 (Universität Basel) 攻读神学博士学位，至 2008 年完成博士学位。

在繁忙的教学与研究的同时，王艾明从未间断神学研究与写作的工作。自从 1999 年至今，他为《金陵神学志》每一期撰写一篇学术论文。《金陵神学志》系季刊，每年出版四期，这样算来，王博士为《金陵神学志》撰稿将近 50 篇。此外还有不少论文发表在其他的教会内外的学术刊物上。这样孜孜不倦的学术研究的精神实属不易，王博士应该说是一位勤奋多产的作家，除了在这文集所收录的 32 篇之外，还有一些很有价值的文章，希望不久能够再编集成册，出版问世，以飨读者。

中国基督教神学思想建设的任务与目的，实际上就是为了使基督教会能够在中国得以健康有序地发展。由于历史客观原因，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前将近三十年 (1949 – 1978) 的



时间里,中国基督教历经考验和磨难,从1958年开始,已经实现事实上的“联合礼拜”,在信仰传统上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可是还未能解决在脱离西方差会的控制之后,应如何办好教会的问题,特别是在教会论方面进行新的系统、完整的探索与思考。“文革”期间,中国基督教和国内其他宗教,曾遭到同样的厄运,停止活动。改革开放以后,1980才逐步恢复活动,此后和国内其他宗教一样,迎来了新的迅速发展的时期。在过去二十多年,恢复和新建了不少教会和堂点,无论在信徒人数上还是在教职员的培训上,都有相当大的发展与突破;同时,也相应开展了一些新的和社会主义祖国相适应的事工,起到荣神益人的作用,得到众人的喜爱。但是,随着信教人数的增多,有几方面的压力和矛盾就凸显出来。从整个社会的层面上来说,中国基督教和基督徒如何真正与广大人民认同,如何最大限度地避免和杜绝片面的、狭隘的、消极的观念,如何能够在中国社会建设与发展巾发挥有效的作用,这些问题都需要在神学上进行探索。对于教会自身来说,首先是教会教牧人员的数量有限,新增加的神学毕业生人数,无法满足教会发展的需求;其次,相当大比例的教牧人员的圣经知识与神学知识还是非常有限,这就导致了对信徒的牧养在质量和效果上都有些滞后;信徒的属灵追求、圣经知识的渴求无法得到满足。有些知识水平较高的基督徒或慕道友在参加教会各种活动之后感觉得不到满足便游离而去。再者,中国教会还有一个重要的但仍未完成的使命,那就是教会的体制与教会的管理的问题。教会论一直是中国基督教一个薄弱点。我们讲基督教在中国进入“宗派已过时



期”，达成事实上的“联合礼拜”。不过，随着教会的发展，这就必然需要对教会论进行探讨与研究，以求构建真正意义的中国基督教会。王艾明博士这一系列的论文就是在中国教会需要努力探索、构建理论与实际结合的中国教会这样的大背景和历史使命中形成的。

1998 年中国基督教在丁光训主教的带领下，提出神学思想建设的任务，是为了使基督教信仰在中国能得到正确的理解，保障基督教会在中国能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和义务，保障教会的传讲的教义能符合圣经的教训；使中国基督教在普世教会中得到理解与尊重；使教会能有效地抵制异端邪说。这些问题，在本书《理解中国教会神学思想建设事工》、《论中国教会神学思想建设的性质和使命》、《关于中国教会神学思想建设的基本步骤的思考》、《神学思想建设浅思》、《从道成肉身到神圣的和解》等文章中，王博士进行了比较系统和深刻的分析和论述。

为了能够在实质上更好地进行神学思想建设，理解和阐述中国基督教神学思想建设的本质与使命，王博士在有关神学与神学的任务方面作出努力积极的探索——《如何理解“神学是教会在思考”》。

神学是什么？历世历代的神学家曾从不同的角度提出多种解释。“神学”(theology)一字在希腊文可一分为二：“神”(theos)和“话语”(logos)：信息、交谈、教训、或讲道，神学是对基督徒所崇拜之上帝的反思，是认识上帝的研究活动，是有关上帝，以及上帝与整个被造世界的关系的科学。中世纪著名神学家安瑟伦(Anselm, 1033 年 - 1109 年)继承



了奥古斯丁 (Aurelius Augustinus, 亦作希坡的奥古斯丁 Augustinus Hippoensis, 天主教译“圣思定”、“圣奥斯定”、“圣奥古斯丁”, 公元 354 年 - 430 年) 的衣钵, 提出了“信仰寻求理解” (*fides quaerens intellectum*), 这一口号或定义可以看作是整个经院哲学的基础。而安瑟伦对这一命题的解释, 更是道出了奥古斯丁主义神学和哲学传统的基本精神: “主啊! 我并不奢想能洞察你的崇高, 因为我无法让我的理解力和你的崇高相比拟。但是, 我渴望在某种程度上理解你的真理, 我的心相信并爱着这真理。因为我不是寻求理解以便相信, 相反, 我是相信以便理解。因为我深信: 除非我信仰了, 我无法理解。”

美国普林斯顿神学院神学教授 Daniel L. Migliore 曾于 1994 年出版一本书《信仰、寻求、理解——基督教神学导论》 (*Faith Seeking Understanding: An Introduction to Christian Theology*, 1st ed. 1991; 2nd ed. 2004), 根据 16 世纪宗教改革以来西方基督教对这一经典性的定义向英美读者阐述了“信仰寻求理解”这个命题。

五十多年前, 当时基督教在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 五十年代中期有短暂一段时间的休整与反思, 1956 年我在《金陵协和神学志》上曾探索性地发表一篇文章——“中国神学建设”^①。在该文中, 我提出“神学是教会在思考”, 这是针对着当时中国基督教的“群众性神学运动”(丁光训主教语)中, 有关神学本身的特性与任务而提出来的, 特别着重教

^① 见 1956 年《金陵神学志》第 5、6 期, 重刊于 1991 年《金陵神学志》(复)第 14、15 期。



会是信仰群体（即教会）作为思考者的主体。安瑟伦和Migliore的经典性定义，都没有明确指出是“谁在信仰，谁在思考”。我在那篇文章中特别强调是“教会”在思考。神学是信仰者群体的参与和反思。神学是教会灵性经验的理论，是历史上某一个特殊时代中教会的宗教经验的总结。作为一种系统的理论，它从传统的教会和信仰的内容出发，将教会某些新鲜而具有特性的灵性经历，在理论上加以整理和提高，并反过来指导教会的工作，指出她前进的方向。神学虽然包含个别思想家对信仰的反省，但与信仰团契或传统有一定关系。另一方面，神学往往是在信仰与生活的交汇点产生：当信徒面对具体的生活问题的时候，信徒会把自己所面临的事情与自己接受的信仰联系起来。当自己经历了某些事情之后，信徒会在信仰上寻求解释。尤其是自己的经历与接受的信仰信息、符号产生张力的时候，神学问题便产生。这也就决定神学与其处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即神学与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也就是神学是在处境化之中的。

神学是与生活息息相关的。神学与生活是分不开的，所以它就不能一成不变，因为生活时空的转变、群体组合与变迁、不同群体之间互动，以及所处的文化、经济与政治等因素的变异都对神学的思考与表达构成不同程度的影响。一个抽离人世间的神学建构、一个自以为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永恒不变的神学系统、一个声称已经把握绝对真理的绝缘体神学论述，都不能有效地回应人世间变幻莫测、错综复杂的生活境况，并且在面对活生生的信仰挣扎与生存悖论时，都只会



显得苍白无力。基督教的神学自古以来便与其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紧密相连的。

圣经告诉我们的上帝一直都是一位对不断发展中的情况有响应的上帝；一个人的神学如果是健康的话，它必须与现实生活处境，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改革开放之后，丁光训主教在多次场合中权威性地确认和宣告：“神学是教会在思考”，并且以先知般的睿见，针对当前中国教会中存在的一些现象和偏见大胆地提出许多命题，曾引起国内外一些教会人士的争论，甚至有人根据这些命题宣称丁光训是个“不信派的标本”。王艾明博士于 2001 年和 2002 年在美国 Pasadena 中国教会事工分享会上把当时几年中围绕着中国教会神学思想建设所引起的争论和误解总结为 15 个基本命题（见《理解中国教会神学思想建设事工》）并以“神学是教会在思考”作为本书的总题目，用以“解释神学思想建设与中国教会”。

王博士在这文集中所有的论文都充分体现了神学研究应该围绕着圣经、传统与现代世界这样的三角架构而展开的。

首先是圣经。圣经是基督教的正典，是上帝给予其子民的信，关于信仰的以及上帝子民在其信仰历程中的领受与行动。圣经是信徒灵性生活的基本依据，也是神学研究的基本来源。

第二是传统。传统是指从耶稣亲自选召、亲自教导的使徒开始而代代相传而来的正统。传统不仅仅指从先人传下来的东西，也是指其中的反思过程：神学或属灵的见解受到



欣赏、评估。传统不是固定不变的某些内容，基督教教会历史上曾经经历过多次重大神学思想的发展与转变。

从普世大公教会的教义来承传基督所立的使徒教训和代代相传的教会传统，引导教会步向正确的解经之途和有利于教会健康成长的方向。对于历史上谈论过的教义应该尽量回到教会历史上神学家的著作中去，努力避免从后代人对神学家的理解的观点上去认识他们。传统有助于当代神学研究理解相关的神学内容，持守历史教会的传统有利于规范教会的信仰，使教会能够持守纯正的信仰，驳斥一切的异端邪说。同时也要强调传统并非墨守成规，死守僵化的教条，而是在继承、反思的过程中接受教会的丰富的思想遗产。

其三是结合现代世界的实际情况，尤其是结合中国基督教所处的具体处境。随着新问题、新环境、新知识的出现，神学的任务要一次又一次地反复进行。今天中国基督教各地教会正大力推行神学思想建设，其主要目的就是在忠于圣经，继承和反思传统的基础上，使基督教在当今中国社会中有以告人的信息。

神学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宣讲(Kerygma)，这在《理解中国教会神学思想建设事工》和《多样性中的统一性》中有充分的论述。神学研究不管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如果不能对当时的人和后来的人有所帮助、有所启发的话，那么神学就不能够达到宣讲的目的。某些个人根据他们特殊的宗教禀赋和经验，在神学上也可能有较为突出的见解和贡献，但如果要对教会广大的群众起任何影响，这种作为神学伦理的根据的灵性经验，必须具有一定程度的广泛性或群众性，必须



在其他的信徒中也能引起共鸣。神学研究一方面要准确有效地理解和解释圣经，并且继承教会的传统。准确理解和解释圣经的一个因素就是要具备正确的圣经观，接受圣经考证学的成果；另一方面，神学研究要与具体的时代环境紧密结合。神学不是抽象的概念，它是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教会历史上著名的神学家、基督教思想家，他们的神学研究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原因就在于他们的神学研究在立足圣经的基础上，在当时有效地解决了教会的问题甚至社会问题。

关于神学研究的任务，简单说，基督教神学具有两大任务：科学性研究和构建性解释。

神学就是科学性的调查、研究和创造性的诠释：科学性的研究就是回归历史的事件中认识信仰——这是客观的；诠释是有创造性的解释和发展：在诠释者本身的历史、文学、人文和自身的经验中对信仰的客体进行阐述。这是变动的，因为历史事件是唯一的，已经发生的事，而再次阐述是主观的，这受到解释者的生活氛围、个人经历、社会因素、文化和思想潮流的影响。解释性的阐释是处境化的：文化、语言、历史、社会等等。这些方面都影响着解释者的阐释。

科学性研究就是回归历史事实中认识信仰，探索信仰信息的历史本真。借助一切可利用的资源，包括圣经文本、词典、圣经合参、多语种圣经合参（圣经多种译本对照）等工具，有时也借助其他学科、其他领域的成果，例如考古学、人文学科的成果探求信仰信息的历史客观真实面。神学性的思考必须是自我协调与合乎逻辑的（不会自相矛盾），也与其他知识的分支能够达成相通的；神学不能与世界和人类的知识存



在冲突。

构建性的解释，简言之就是探询信仰信息对于当今教会、信徒的具体实际信仰、生活有什么样的价值。

我们是基督徒，同时又是中国人，也像其他人一样是人类的一分子。我们在此有一个宗教身份和文化身份。宗教与文化(背景)都代表了某种我们不愿意疏离的东西，不可能有了这个而没有了那个。当我们讲“中国(基督教)神学”的时候，我们是意识到同时作为中国人及基督徒的重要性为开端的。关于这一点，《论传统与中国教会》、《中国教会神学思考的范式》有着独特的论述。

身份的问题对人的生活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倘若神学包括对人自身的反省，是一种自我认识的形式，那它应从我们的生活中看到其意义，即从我们与宗教、文化背景的关系及我们与基本委身的关系去看我们究竟是谁。

首先，我们是否可以选择中国人或基督徒的身份？基督教信仰应该讲求有意识的自由选择。但从神学的角度说，我们有些人可能被“预定”了的，我的意思是说，生活在上帝恩典的意识下，体验到作基督徒的使命。这是新教传统的一个重点。这样身份的问题就直接与命运(destiny)有关，但从更深邃的自我意识的层面去看，岂不可说，我们也是这样成为中国人，即我们是中国人也是被“预定”的？！

我们似乎可以为了别的信仰或文化而放弃了自己原有的信仰或文化，以为原来的已经失去了意义，或者疏离，甚至贬视自己的文化。这是不应当的，也是非常可惜的事情。相反，有人固执于我们的文化或宗教传统，以为它所赋予给我



们身份的意义是永远也不变的,这也是一种错误。

我们应该主动地使其变为适切,在内化它的同时给予它新的意义。我们可以寻找一种切合我们理解的过去传统及将来命运的诠释和生活方式。这样,哲学或神学的任务便在于提供一个指示范围或进程方向,借此可找到一个富有意义的身份。

因此,一个中国神学工作者可以从中国人及基督徒两者的关系去理解作为中国人及作为基督徒的意义。无论如何在从事其神学工作中,作为一个原则,没有必要为了我们的信仰的缘故否定我们的文化,也没有为了我们文化的缘故否定我们的信仰。信仰与文化的张力虽然有时令人十分地苦恼,结果甚至有可能会诱导人放弃其中的一种,或者其中一种会被削弱。但是,这张力肯定很有创造性。

论文集另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在中国背景下有关教会论的探索、研究与前瞻。王博士努力通过对教父、改革家等重要的教会传统资源的研究与探索,结合中国教会的现实情况,论证中国基督教在具体教会的教会论建设上可能的途径。

探讨教会论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现在中国教会事实上已经形成宗派已过时期,总体上教政体系介于长老制和公理制之间。但是,问题还有很多,一方面教会总体上是保持相互尊重的态度,各个堂点保持有其自身一定的宗派传统,表现在崇拜方式、圣礼等方面;另一方面,一些教会派别仍然保持其固有的传统模式比较明显。再者,大部分改革开放之后加入教会的信徒,对教会传统、崇拜方式、礼仪等方面认



识基本上是偶然的。这部分信徒，对于教会的不同传统基本上没有任何的概念。这总体上是好的。不过，一个教会要保持其自我的身份特征、教会管理上能够比较有效地得以开展、教牧人员与平信徒之间能够最大程度上达成有效的搭配，形成相对一致的教会论是非常必要的。不过这样的事工现在在中国教会之中开展起来，仍然有许许多多的困难。王博士对中国教会的方方面面进行比较深入地研究和探索，他以独特的视角和敏锐的思辨能力，提出若干建议进行前瞻性的论述。

《远象中的中国教会》探讨了构建中国教会的教会论，其基本原则自然是从圣经教导为出发点，以教会传统，特别是教父与宗教改革家的神学理论等重要资源为我们理解的重要支持与帮助。

对于中国教会来说，从组织机构管理的角度来说，有一个基本的原则，正如《理解中国教会神学思想建设事工》、《论中国教会神学思想建设的性质和使命》、《关于中国教会神学思想建设的基本步骤的思考》、《从教牧层面看丁主教神学思想的实践意义》、《神学思想建设浅思》中谈到“三自原则”为建立中国教会的基本理论课题。三自爱国运动很快便迎来六十周年的纪念，三自爱国运动作为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的方向，有着教会自身发展的必然性与必要性。了解三自爱国运动的历史、研究和总结三自爱国运动的成就和经验是中国教会一项重要的工作与任务。更进一步来看，借此激发和提高基督教的社会责任与爱国热情，不仅仅是外在的适应时代，而且是从思想和理念上真正主动地激发基督徒应有的



“双重爱的使命”——爱上帝与爱邻舍，使基督教能够主动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从地上的教会这个角度上来说，这本身对于教会的发展和稳定也是必要的。

牧职是教会论的关键所在，目前，普世教会，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诸多派别之间最大的分歧，或者说，教会论方面影响和决定教会的合作上最大的困难就是有关牧职的理解。此外，平信徒与教牧人员的关系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基础。《论普通平信徒信仰素质的提高》、《谈谈教会的形象》、《谈谈牧者的威信》、《论普遍祭司权原则及其对中国教会的实践意义》、《论普遍执事权》、《论教会的权威性》、《论教义学理解中的教务会议制及其对中国教会的实践意义》等文从许多角度提出问题，也列出若干可能的参照框架。

牧养有两大类圣工，那就是宣讲 (Kerygma) 和服侍 (Diaconia)。作为教牧人员，讲道和圣礼也不是牧养的全部内容。牧养同时也要求传道人能够带领一个团契，就是帮助基督徒团契能够很好地合作，能够成为担负一种世界使命的信仰团契。尽管牧养过程中领袖的任务是非常烦琐的，但是他们就是使福音能影响人类生命之根本所在。讲道、施行圣礼，以及领导整个信仰团契只能够使福音丰富和真正影响整个团契或个人的生命。然而，讲道、施行圣礼和领导团契还不是牧养的全部。因为基督徒常常在有特殊需要或问题出现的时候需要互相帮助，这就是教牧关怀。不管是圣职人员还是平信徒领袖都是在上帝的恩召之下，应该在各自的教会侍奉岗位上尽忠职守。

作为神学院的副院长、教务长，其工作关系到神学院的整



个教学与研究的方向。对于一种宗教来说，教职员的培养及其教义的研究都是关乎自身的发展、甚至存亡的大事。对于基督教来说，神学教育和神学研究的成功与否将直接决定教会的发展和方向。神学教育不单单需要具备其他教育领域的要求，同时，也需要以基督的精神和教会的使命来引导和影响学生。培养学生整全人格的发展，使仁爱、真知、公义、谦让、服侍的精神真正深入所有神学生的生命，成为一生侍奉与工作的动力。同时，神学院培养学生的目不仅仅仅要具有宽广的知识，掌握获得知识的途径、处理资料的方法，对专业知识有丰富的涉猎，也要保持不断学习的精神与习惯，也要有宽广的胸怀。《中国教会的神学教育与远象》、《论中国教会神学教育学研究之主题与思路》等对此有很好的论述。

总之，这是一本值得大家阅读的神学论文集，其最大的特色就是立足中国和中国基督教，本着圣经，以两千年基督教会传统，特别是教父学和宗教改革家的神学理论为重要参照，努力探索构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教会的重要尝试。

我真心希望能够引起大家兴趣的不仅仅是书中重要的见解和理论，也希望能引起中国基督教会内外的人重视神学理论的探索，不仅能够在中国兴起更多的有益于基督教会、有益于社会的理论探索的热忱，正如《远象中的中国教会》中所说的，真心期望，在不久的将来，基督教在当今中国社会真正成为社会的良心。

2009年圣诞节于南京